

关税同盟理论述评

裴武威

关税同盟是一种重要的一体化组织,它有下面几个主要特征:①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全部取消;②对来自同盟外的进口征收统一的关税;③在成员国之间按一致同意的方式分配关税收入。^①作为一种国际经济现象,关税同盟由来已久,仅在1918年至1924年间就曾有过16个关税同盟先后存在。而关税同盟理论的萌芽形态也可以追溯到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对当时出现的一些优惠贸易安排和关税同盟所作的评论;尤其是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以后,围绕关税同盟的经济影响问题,在麦克库洛赫等人和李斯特之间曾爆发过一场激烈的论战,双方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对后来的关税同盟理论产生了一定影响。不过,作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具有相对完整理论体系的关税同盟理论,其奠基之作被公认为是美国人雅各布·瓦伊纳于1950年出版的《关税同盟问题》一书。后来,随着现实世界中一体化安排(尤其是关税同盟)的日渐增多,该理论也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国际经济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理论分支。

一

关税同盟理论,尤其是60年代以前的关税同盟理论,主要分析关税同盟的建立对贸易流从而对有关国家经济福利的影响。

这种分析框架,是由瓦伊纳最早确立的。在瓦伊纳之前,对关税同盟的性质存在着两种不同看法,自由贸易论者(如哈伯勒

等人)认为关税同盟是倾向于自由贸易的;而保护主义者则认为关税同盟是一种有效的保护手段,是偏离自由贸易的,不过他们对关税同盟都持欢迎态度。瓦伊纳认为,对关税同盟的性质不能做出先验的判断,需要通过考察现实世界中关税同盟的实际运行情况后才能对此做出回答。为了分析关税同盟的经济效应,瓦伊纳提出了两个概念来说明组建关税同盟所引起的某种商品生产区位的变化:贸易创造和贸易转向。所谓贸易创造就是“关税同盟的一个成员国现在将从另一个成员国新进口一些商品,而在先前,它根本不进口这些商品,因为受保护的国内商品的价格低于外国商品的价格加关税。”^②所谓贸易转向就是“关税同盟的一个成员国现在将从另一个成员国新进口另外一些商品,而在同盟成立之前,这些商品它本来是从第三国进口的,因为即使在支付了进口关税以后,它仍是最便宜的可能的供给来源。”^③瓦伊纳认为,贸易创造使得贸易商品的生产地点由低成本成员国转向低成本成员国,因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给成员国带来福利增加,它代表了关税同盟的自由贸易方向。而贸易转向使得贸易商品的生产地点由低成本的第三国转向高成本的成员国,因而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成员国遭受了福利损失,它代表了关税同盟的保护贸易方向。这两种效应相互比较的结果就决定了关税同盟总的福利意义和最终性质。一个贸易创造占优势的

关税同盟会为成员国带来净福利增加,其发展方向是自由贸易;而一个贸易转向占优势的关税同盟会造成成员国福利水平的下降,其发展是背离自由贸易的。后来李普赛等人根据关税同盟福利效应的这种不确定性称关税同盟为“次优”的一个典型例子。所谓“次优”,简言之即在一个一般均衡体系中如果引入一个限制性条件使得不可能满足一个帕累托条件,那么其它的帕累托条件即使是可以达到的,一般来说也不再可取。在存在贸易保护的世界上,组建关税同盟作为一个迈向贸易自由化的中间步骤及实现完全帕累托条件的过渡,不能必然导致世界生产效率的改善,具体地说,贸易转向可能超过贸易创造。上面的分析重点是关税同盟对成员国做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影响。此外瓦伊纳也分析了关税同盟对单个成员国、非成员国及整个世界的福利后果。他指出,一个关税同盟若是贸易创造型的,则至少一个成员国可以从中受益,两个成员国都有可能获利,在一般情况下,这对整个世界也是有利的;而非成员国至少在短期内遭受了损失,不过在长期内可以通过同盟经济增长效果的扩散获得贸易扩大的利益。关税同盟若是贸易转向型的,则至少一个成员国要遭受损失,两个成员国都可能受损,非成员国及整个世界也都会受到损害。

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指出,瓦伊纳分析的有效性实际上依赖于几个暗含的基本假定,如固定消费比例、不变成本等。关税同盟理论的一些重要进展就是通过放松这些假定而取得的。

李普赛和格雷尔斯等人认为,如果去掉固定消费比例这个非常不现实的假定,那么瓦伊纳关于贸易转向引致福利降低的结论就要受到怀疑。假定在关税同盟成立之前,一国对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导致国内消费者所面临的相对价格和生产产品的实际机会成本之间出现差距,从而影响了最优状态的实

现。组建关税同盟以后,来自成员国的免税进口替代了原来以第三国的进口(亦即发生了贸易转向),这必然会导致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从而有可能消除相对价格和机会成本之间的差距,实现最优消费均衡。这种最优状态是通过消费者以现在较为便宜的商品取代较为昂贵的商品,改变消费比例而实现的。^④对关税同盟消费效应的分析,实际上是对瓦伊纳分析的补充。瓦伊纳主要分析了组建关税同盟所引起的生产地点在有关国家之间的转移,也就是说,他分析的重点是国家间的替代效应,李普赛等人则增加了对商品间替代效应的分析。

麦尔文和巴格瓦蒂放松了瓦伊纳的另外一个假定:不变实本。他们都假设,一国的生产转换函数是向内凹进的,然后分析通过组建关税同盟差别性地削减关税对该国生产的影响。他们的基本结论是:即使保留固定消费比例假定,贸易转向也会通过影响本国生产而引致福利增加,它有可能超过贸易转向的福利损失从而获得净福利增加。

李普赛则通过将关税同盟的“3国2商品”模型扩展到“3国3商品”模型,而从另一方面推进了关税同盟理论。对贸易转向福利意义的修正和补充使得一些人认为,可以对关税同盟做出一个一般性的判断:组建关税同盟总是能带来收益增加。李普赛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上述观点的错误在于它是建立在“3国2商品”模型之上的,在这样一种模型中,只存在本国、伙伴国和非成员国3个国家和本国自产品、来自伙伴国的进口品两种商品,因而也只存在一个最优消费均衡条件:这两种商品的相对价格等于边际转换率。实际上在对关税同盟的分析中还应包括第3种商品:来自非成员国的进口品,这样就需要满足3个最优条件。组建关税同盟只能满足一个最优条件,因而它只是从一个非最优位置移向另一个非最优位置,最终的结果仍是不确定的,这样关税同盟仍

然只是一种“次优”选择。^⑤在李普赛之后,伯格勒斯等人又建立起多种更为精致的“3国3商品”模型,并从中得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结论。

关税同盟的“次优性”受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怀疑。库帕和马赛尔认为,可以将关税同盟的形成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一国无差别地将对外关税降至某个水平(如 t_0);第二步,该国取消对伙伴国的关税与之组成关税同盟,而对非成员国仍保持 t_0 的税率。关税同盟的经济影响也相应地分为两方面,第一步会产生削减关税效应;第二步会产生纯粹的贸易转向效应。前者包括瓦伊纳所称的贸易创造效应和李普赛等人提出的消费效应,它是该国福利改善的唯一源泉;后者即是瓦伊纳所称的贸易转向。可以看出,如果以无差别地削减关税作为参照系,那么关税同盟的结果是变得更差了,因为比起无差别的关税政策,关税同盟导致了纯粹的贸易转向,这样“次优”理论就难以说明关税同盟的性质。^⑥库帕和马赛尔的分析对后来关税同盟理论的发展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1)它认为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不是组建关税同盟的原因,从而促使后来的经济学家将注意力转向关税同盟其它可能的潜在收益来源,如贸易条件效应、动态效应等。(2)它提出了关税同盟的经济合理性问题,引发了后来对该问题的一系列探讨。下面我们首先论述第一方面,即经济学家对贸易条件和动态效应的分析。

早在1950年,瓦伊纳就注意到了关税同盟对贸易条件的影响。他指出:“一个关税同盟通过扩展实施单一关税疆界的范围,从而倾向于提高关税对改善该区域与外部世界贸易条件的效能。”^⑦瓦伊纳也意识到组建关税同盟对加强该区域在对外关税谈判中的地位的作用。不过在大部分关于关税同盟的研究文献中一般都假设本国是个小国,无力影响外贸条件。一旦放松这个假定就可以分

析关税同盟的贸易条件效应。假定关税同盟成立以后,本国的进口来源由非成员国部分地转至伙伴国,由于本国是个大国,因而它对非成员国出口需求的减少会引起其出口价格下降,从而本国和同盟的贸易条件得到改善;而对伙伴国出口需求的增加引致其出口价格的上升,伙伴国的贸易条件也得到改善。伙伴国和非成员国的供给弹性对贸易条件效应有很大影响。在发生了一定量的贸易转向之后,若非成员国的供给弹性较小,则其出口价格的降幅就较大,本国获利也较多;若伙伴国供给弹性较小,则其贸易条件也可望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总的来说,伙伴国和整个同盟的贸易条件肯定能得到改善,非成员国的贸易条件肯定会恶化,而本国和整个世界能否得利是不肯定的。因为本国对非成员国的贸易条件虽然得到了改善,但对伙伴国的贸易条件却恶化了,因而总的结果是不确定的。除此以外,同盟作为一个整体,其贸易条件还受非成员国关税政策的影响。同盟在与非成员国的贸易谈判中比单个国家拥有更大的讨价还价能力,因而能比较有效地阻止其它国家对来自同盟国家的进口提高关税,也能较为有效地实施自身的关税政策而免遭非成员国的报复,这些都会给成员国的贸易条件带来有利影响。

所谓动态效应是指在一段较长时期内显现出来的能对成员国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那些方面。这是和静态效应相对而言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向就是两种最重要的静态效应,它们都是通过影响贸易流的变动从而一次性地表现出来的。动态效应主要包括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投资效应等几个方面。

规模经济是指在关税同盟成立之前,一些企业由于市场范围的限制一直在最优产量(最低成本产量)以下运作,组建关税同盟所引起的市场范围的扩大有可能使这些企业在最优产量上生产,从而带来成本节约。瓦

伊纳在1950年曾触及到这个问题,科登在1972年对规模经济效应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若在关税同盟成立之前,两国在各自的保护关税下都生产某种产品,则在同盟成立之后,其中效率较高的一国会占领整个同盟的市场。由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它可以在最低成本处生产,从而降低了平均成本,给这两国都带来福利增进。科登称之为成本降低效应。若在同盟成立之前,两国都不生产某种产品而由第三国进口,同盟成立之后,在共同关税的保护下,其中效率较高的一国仍会占领整个同盟的市场,从而以较为昂贵的国内生产取代了较为便宜的外部世界的进口,产生了类似于贸易转向那样的福利损失。科登称之为贸易压制效应。规模经济效应能否给成员国带来福利改善也是不确定的,它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相互比较的结果。

上面所分析的规模经济是内在于企业的。有些企业或行业在关税同盟形成以后还能获得某种正外部性,从而会对它们的某些成本或成本结构产生有利影响。另外还有几种动态效应:①投资效应。同盟的形成会促使非成员国增加对同盟的投资(被称为“投资创造”)及将对其它非成员国的投资转移至同盟成员国(被称为“投资转向”)。以避免它所受到的歧视性贸易待遇。②竞争效应。同盟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加剧了成员国企业之间的竞争,从而导致这些企业经营效率强制性的改善;竞争效应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即由于来自非成员国竞争的削弱所引起的同盟内企业经营效率的下降。这两者分别被称为“冷水浴效应”和“土耳其浴效应”。③贸易格局的变化所引致的投资变动和技术水平的改变也会引起可利用的生产要素数量和质量的变化。

二

在瓦伊纳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关税同盟理论的重点一直是探讨关税同盟的经济影响

而以关税同盟的存在为前提,却忽视了关税同盟存在的基本经济原因或称经济合理性。所谓经济合理性就是要回答“为什么要成立关税同盟?”这样一个问题,说明组建关税同盟是一种最优的政策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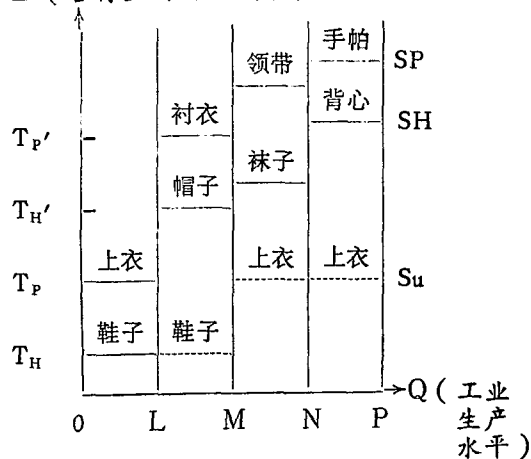
从关税同盟的经济影响出发是不可能发现其经济合理性的。因为经济学家们对关税同盟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最后仍然不得不承认关税同盟性质的不确定性即“次优性”。不仅如此,库帕和马赛尔还指出:若以无差别地削减关税的贸易政策为参照系,则关税同盟会导致纯粹的贸易转向,因而组建关税同盟要劣于那种非优惠性的关税政策。这说明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不可能是组建关税同盟的经济原因,需要发展一种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来说明关税同盟的经济合理性。在这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是库帕和马赛尔及约翰逊3人,1965年他们几乎同时独立地提出他们关于关税同盟的新理论,后来人们称之为关税同盟的“公共品”论据。④

约翰逊是在研究关税和保护主义的经济原因时提出其关税同盟理论的,而库帕和马赛尔则是在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这样一种背景下探讨了关税同盟作为一种“发展手段”的问题,不过他们对于关税同盟的分析思路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认为,传统的关税同盟理论是建立在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之上的,根据这种理论,一国的经济福利仅来自私人对产品和劳务的消费,这样对福利最大化的追求必然导致以资源配置效率作为经济政策的评价标准,而最优的政策选择也就必然是自由贸易或修正的自由贸易。这种立场将保护主义和其它的限制性贸易政策视为政府非理性选择的结果,将关税视为“一种无效率的取得收入的方法”。具体到关税同盟问题上,同盟虽对内实行自由贸易,但对外却设置共同的关税壁垒,这自然要劣于那种非歧视性地削减关税的贸易政策。他们认为这种正统理论的缺陷在于它排除了“公

共品”消费的福利意义。实际上在一国的社会福利函数中不仅包括私人产品而且还应包括公共品。所谓公共品是指在消费上不具有排它性或排它成本极高的物品或劳务，象国防、公路、大型水利设施都是典型的公共品。约翰逊等人将这个概念借用到贸易政策领域。他们认为，公众对工业生产这种经济活动的集体偏好可以被视为一种公共品，之所以存在这种偏好是由于公众可以从中获得一种与直接从消费这些产品中得到的满足不同的满足，这种满足可能是民族主义的冲动，也可能是工业生产所产生的正外部性。公共品的特性使得提供公共品的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与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有效地提供公共品就需要政府的适当参与。就工业生产这种集体偏好来说，政府可以通过对国内生产或出口提供直接补贴，或者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来满足社会对扩大工业生产的向往。从效率角度看，直接补贴要优于关税，因为它引致的损失较少。但是关贸总协定及一些国际协议对出口补贴的限制及国内各利益集团相互争斗的结果使得政府不得不放弃直接补贴这种政策选择，这样关税就成为必然选择。关税的合理性得到了证明。然后他们比较了不同关税政策的效率，他们的结论是：比起一国单独运用无差别的关税政策，通过组建关税同盟采用集体保护政策来共同提供上述的公共品要更有效率。这里效率的含义是：保持原先的工业生产水平而成本（以损失的国民收入来衡量）较低，或以和先前同样的成本生产更多的工业品。下面我们运用库帕和马塞尔的分析方法来说明这一点。

如右图所示， S_H 和 S_P 分别为关税同盟成立前H国和P国的供应曲线，也是两国工业产品的平均成本曲线，表示国内生产的平均成本高于世界市场价格的程度。两国对生产这些产品有强偏好。假定两国的最优产量都为OM，为达到这个最优产量，在各国独立

E (各行业的超额成本)



实施无差别的关税政策的情况下，两国需要对不同产品设置不同的有效关税。 H 在 OT_H 的税率下生产OL的鞋子，在 $OT_{H'}$ 的税率下生产LM的帽子； P 则在 OT_P 的税率下生产OL的上衣，在 $OT_{P'}$ 的税率下生产LM的衬衣。关税同盟成立以后， S_u 成为新的同盟供给曲线。它位于原供应曲线之下，原因有二：①产品是在同盟内最低成本地生产的；②可通过低成本产业扩大产量来保持原有的工业生产水平而不必求助于高成本产业。新的最优状态是： H 国在 OT_H 的共同关税下生产OM的鞋子， P 国在 OT_P 的共同关税下生产MP的上衣。可以看出，和在无差别的关税政策下的情形相比，两国都保持了原先的产量水平，但关税水平较以前为低，说明保护的成本也较低。这样通过放弃高成本产品的生产而专业化于最低成本产品的生产，两国都获得了一定的成本节约， H 国为 $T_H T_{H'}$ 乘LM， P 国为 $T_P T_{P'}$ 乘LM。这个结果是由于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共同作用而产生的。较低的成本使得两国生产和以前同样的产量后还有资源余留，可以再用于增加产量和国民收入，这是收入效应。生产成本的降低意味着生产决策会继续偏向这种产品，产量也会增加，这是替代效应。对整个关税同盟来说，通过对鞋子和上衣生产进行共同保护，全同盟可以以最低成本生产出和原来一样的产量水平，从

而整个同盟的实际国民收入达到最大。

这样约翰逊等人从公共品消费对社会福利水平的经济意义出发说明了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的经济理由。接着指出,在国内外存在着一系列对政府政策的限制性因素的条件下选择关税政策的必然性。最后通过比较关税同盟和非歧视性关税政策的相对效率得出关税同盟是一种福利极大化政策选择的结论,说明了关税同盟的经济合理性。

后来琼斯等人从外部性和市场不完善的角度探讨了关税同盟的经济原因。^④简言之,组建关税同盟可以将国际贸易领域存在的一系列外部因素“内部化”,并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实施共同的竞争政策消除市场不完善。琼斯认为,这两个论据可以在原则上提供一种支持关税同盟的强有力的一般性依据。鉴于外部性和市场不完善与公共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可以认为这两个论据是“公共品”论据的发展。

三

关税同盟理论发展至今,已成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的核心和主体。它不仅可以用于关税同盟问题,对于其它形式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优惠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一样都属于优惠贸易政策的范畴;而对于更高级的一体化形式来说,关税同盟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此外,公共品思想也为说明更高级的一体化形式的经济合理性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思路。不过,我们仍然不能简单地以关税同盟

理论来代替一体化理论,因为共同市场、货币联盟等高级一体化形式已经涉及到要素流动、政策协调等方面,这是关税同盟理论所力不能及的。而关税同盟理论本身也还存在着一系列明显缺陷,如它的分析方法从根本上说仍是静态的,对动态效应的分析还不够深入。尤其是随着现实世界中一体化实践的迅速发展,出现了许多传统理论难以解释的新问题,如“成长三角”等。这些都对关税同盟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践要求关税同盟理论有进一步的发展。

注释:

①②③⑦雅各布·瓦伊纳:《关税同盟问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950年版,第43、57、57、55—56页。

④R·李普赛:《关税同盟理论:贸易转向和福利》,载《经济学》1957年2月第93期。

⑤李普赛《关税同盟理论概览》,载英《经济杂志》,1960年9月第70期。

⑥C·库帕和B·马赛尔:《对关税同盟理论的新看法》,载《经济杂志》,1965年12月第300期。

⑧他们的理论主要体现在两篇论文中:约翰逊:《关于保护主义、关税谈判及关税同盟形成的经济理论》,美《政治经济学杂志》1965年6月号第63卷;库帕和马赛尔:《关于发展中国家关税同盟的一般理论》,《政治经济学杂志》1965年10月号。

⑨参见A·阿格拉主编《欧共体经济学》,第3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责任编辑 林玲)